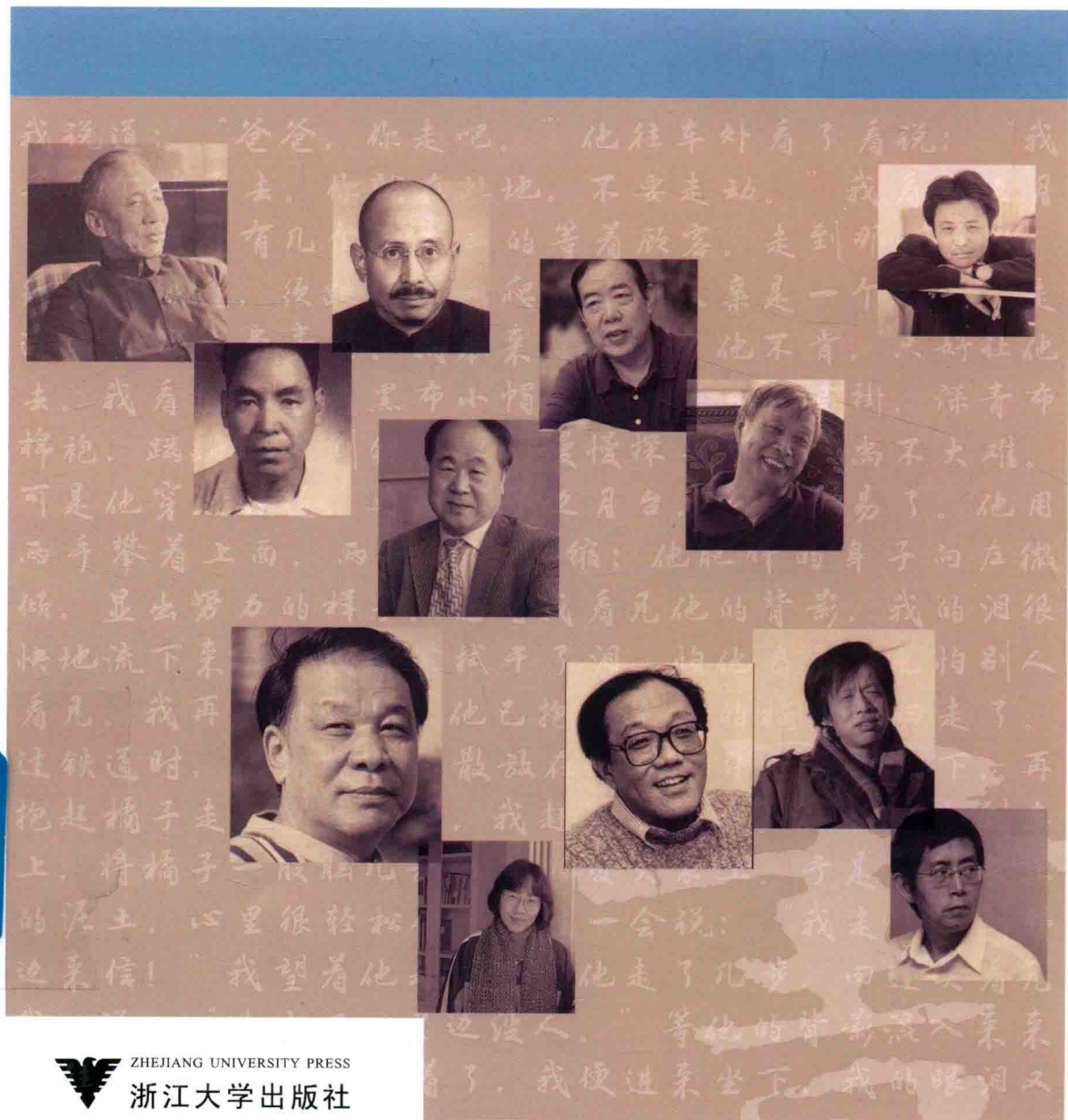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下册)

第二版

高玉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下册)

第二版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高玉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全2册 / 高玉主编. —2版.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308-17702-3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4473 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第二版)

高 玉 主编

责任编辑 叶 抒

责任校对 虞雪芬 杨利军 夏斯斯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8

字 数 702千

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2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702-3

定 价 88.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CONTENTS

第五章 “十七年”文学

第一节 新中国文学的生态和体制	001
一 文学转折和第一次文代会	001
二 新中国文学的体制	003
三 文艺批判运动和政策调整	005
第二节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008
一 农村题材小说成为主潮	008
二 赵树理的小说及其评价史	010
三 柳青的《创业史》及其争论	013
四 周立波《山乡巨变》的民俗乡情	015
五 “十七年”农村题材短篇小说	016
第三节 “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021
一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经典形态	021
二 “史诗性”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022
三 “传奇性”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026
四 孙犁的“抒情性”革命历史小说	028
五 反映知识分子成长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030
六 《红岩》的写作方式及其教科书功能	033
七 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	034
第四节 “十七年”诗歌	037
一 诗歌的传统和特点	037

二 叙事诗和政治抒情诗	039
三 郭小川诗歌	042
第五节 “十七年”散文	045
一 散文的复兴和发展	045
二 三大散文家	047
三 杂文创作	050
第六节 “十七年”戏剧	053
一 戏剧的创作和发展	053
二 老舍《茶馆》	055
三 历史剧的创作	057
四 “革命教育”话剧	059

第六章 “文革”文学

第一节 “文革”文学理论	062
一 《纪要》的主要内容	062
二 《纪要》的“文学理论”	065
第二节 “文革”小说	068
一 样板小说	068
二 时代小说	073
三 地下小说	088
第三节 “文革”戏剧	090
一 样板戏的来源与命名	090
二 “文革”样板戏	092
三 话剧	098
四 其他戏剧	102
第四节 “文革”诗歌	107
一 时代诗歌	107
二 非典型诗歌	112
三 地下诗歌	115
第五节 “文革”散文	126

第七章 新时期文学

第一节 新时期小说潮流	130
一 伤痕、反思与改革文学	130
二 “知青文学”	135
第二节 新时期报告文学	138
一 知识分子的伤痕书写	139
二 改革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	141
第三节 “归来的诗歌”	146
一 “半棵树”与“鱼化石”	148
二 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	151
第四节 新时期散文	155
一 涕泪交零的哀祭散文	155
二 巴金的《随想录》	162

第八章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

第一节 “寻根文学”	165
一 理论主张	165
二 小说叙事与文化意味	167
第二节 “先锋小说”	169
一 “先锋小说”的出场与文学形式实验	169
二 艺术真实观之变	170
第三节 “新写实小说”	173
一 命名中的“现实”期待	173
二 日常生活的客观化叙事	174
第四节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	176
一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格局	176
二 女性诗歌	180
第五节 女性散文	182
一 女性散文作家群的显现	182

二 “人性”话语建构中的精神取向	183
三 “自我”的艰难追寻	185
051 第六节 “实验戏剧”	186
052 一 从配合时势之作到戏剧观大讨论	186
053 二 “实验戏剧”的艺术探索	187

第九章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

054 第一节 重识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	190
055 一 背景概况:从文化热到经济热	191
056 二 历史的大转型:90 年代文学的开始与拐点	193
057 三 文学史观与分期:90 年代的文学史意义	196
058 第二节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事件与现象	201
059 一 文学的底层:从“新写实”到“现实主义冲击波”	202
060 二 在两岸文学与女性文学格局中的“三毛热”	204
三 “下海”与文学的商业化	205
四 废都与废墟:关于陕军东征与人文精神讨论	207
061 五 网络文学兴起的时代	208
062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创作	211
063 一 小说	211
064 二 诗歌	219
065 三 散文	227

第十章 新世纪文学

066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的发生和文学场的划分	235
067 一 新世纪文学的起点:聚焦 1997	235
068 二 文学制度与新世纪文学的发生	237
069 三 媒介传播与新世纪文学的发生	240
070 四 消费文化与新世纪文学的发生	241
071 五 新世纪的三个文学场域及其写作规则	242
072 第二节 主流文学的创作转向	245

一 刘震云：从小说到影视	245
二 余华：从个体到群体	250
三 韩东：从诗歌到小说	255
四 残雪：从艺术到真理	260
第三节 消费文学的文学景观	263
一 韩寒现象：“什么坛也都是祭坛”	263
二 郭敬明现象：“45度仰望天空”	266
三 “80后写作”与网络类型文学	270
第四节 独立文学的艺术潜流	272
一 王小波：“对文学可能性的自由探求”	272
二 “文学自由坛”文学	275
三 陈卫：“对不可言说之物的独立言说”	283
四 “黑蓝”文学	286
第五节 代际内外的文学生力军	294
第六节 新世纪散文	300
一 文化散文的赓续	300
二 “新生代”散文的嬗变	302
三 智性散文	302
四 新媒体散文的发展	304
五 新世纪报告文学	305

第十一章 儿童文学

第一节 晚清儿童文学	308
第二节 现代儿童文学	310
一 五四前后的儿童文学	310
二 三、四十年代的儿童文学	313
第三节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儿童文学	316
一 “十七年”儿童文学	316
二 “文革”十年儿童文学	319
第四节 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	320

一 儿童小说	320
二 童 话	322
三 儿童散文和儿童诗歌	323
四 儿童剧	324
五 图画书的兴起和发展	324
第五节 台港澳儿童文学和华文儿童文学	325
后 记	327



第五章 “十七年”文学

第一节 新中国文学的生态和体制

一 文学转折和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宣布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十七年”文学由此拉开了序幕。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时间段的文学,即是“十七年”文学,它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发生阶段。在这一时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必须以“一元化”的方式存在,不同思想和艺术倾向的作家和作家群的共同存在已成为过去,左翼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到解放区文学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政权的确立也进一步成为文艺界唯一的主导力量。新中国建立后,新的文学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包括文艺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作家的组织管理、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文学批评的原则和规范的确立和实施等,它们共同构筑了新中国文学的时代规范。

新中国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发生期,它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按照以1949年为分界点,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划为两大块的分法,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似乎有着天壤之别,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一大批现代时期的重要作家如老舍、丁玲、郭沫若、冰心、曹禺、穆旦、艾青等都跨越了现代和当代两个文学时期。其次,新中国文学与作为现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再者,五四文学精神在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虽然已不被主流文学所提倡,却也并未消失,而是形成了一种非主流和隐性的发展线索,体现了当代文学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对此,陈思和提出了“潜在书写”^①的概念。

^①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是文学转折的标志性事件。1949年7月2日到19日,来自解放区、国统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和被邀请的非正式代表共计824人。这次会议被看作是四十年代不同政权下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师性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表讲话,这反映了国家政权对文学艺术之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强调了工农兵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他们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表现对象。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也作了更具针对性的报告。周扬对解放区贯彻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文学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肯定。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自其诞生起就被看作是左翼文化前进的指南针,而第一次文代会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文艺方向仍然是进一步贯彻《讲话》讲话精神。

第一次文代会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国家领导人和文艺界领导的发言都对40年代不同区域的文艺创作的成就进行了等级性的划分和认定,在毛泽东《讲话》讲话精神指导下的解放区文学具有明显高于国统区文学的政治优势。由此,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新中国的文艺发展方向,也就是以毛泽东《讲话》讲话为根本指导思想,不同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作家都被统一到相同的政治规范下进行文学实践活动。从理论上讲,过去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似乎都不复存在了,都得到了解决。实际上,尽管新的文学体制的建立是以获得文化领导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为目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新的文化阵营内部,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消失了。可以看到,在“十七年”文学中,不同的观念、创作追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时候冲突还会变得更激烈,这也就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坛不断“起伏”的状况,虽然“起伏”的结果最终也是回到“文学政治化”的轨道上来,但这一变动过程已充分说明,即使在政治化的环境中,文学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因此,文学转折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文学是一个零的开始,它本是在多种文学传统的背景下起步的,而从各种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也是它发展的必然前提。从纵向来看,五四文学传统作为现代思想和文化的母体,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这种影响同样也延续到革命战争文化中,因此,五四文学传统对于新中国文学来说是不能回避的精神资源;此外,毛泽东《讲话》讲话就成为指导作为解放区文学合理延伸的新中国文学前进的纲领性文件,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并塑造了新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从横向来看,苏联作为创立社会主义模式的“老大哥”,其文学经验对新中国文学的借鉴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很多文艺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文艺理论的建设等都直接借鉴苏联经验。但是,这三种文学资

源对新中国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却并非在同一个平台上,由于政治话语在不同时期对这些文学资源所赋予的价值等级的不同,这些文学传统和资源对新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存在着显和隐、主和次、强和弱等不同层次的区别。同时,新中国文学对每一种文学资源的评价和接受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当下性,因此对这些传统和资源的继承和吸收也是有选择、有轻重的。在对待五四文学传统的立场上,在处理五四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关系上,在借鉴苏联文学经验的态度上,实际上,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同时,按照现实的需要,主流文学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二 新中国文学的体制

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管理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作为构成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和实施就是政府对于文学艺术领导、监督和控制的具体化,包括文学话语体系、文学运作方式以及管理、监督机制等的建立。

从第一次“文代会”到以后的各次“文代会”,“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中国文联和作协的管理、监督、组织功能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败。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全国文联”(后改名为“中国文联”),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以及属于“文联”管理的各种协会的负责人。“文代会”后,又陆续成立了下属于“文联”的各种协会,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就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批判运动以及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的讨论,都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的,其在对作家的监督、管理中,常以“决议”的方式对作家和事件作出政治裁决。同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内都设有“党组”,并下属于中宣部,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受到党的直接领导,通过统一性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以及规范化的章程和制度,新中国的文学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它为国家和政党对作家及其创作的管理提供了保证。

在文学体制的建立中,报纸、杂志也是重要的文学组织形式,是党在文艺界行使其机能的重要媒介。期刊、报纸一方面对文学创作、交流活动有积极的协调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党的机关刊物,通过开展文学批评对政策导向和舆论宣传起到重要作用。

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中最重要的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它们的主编和编委通常是文艺界的高层领导人,不过,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更迭,这些机关刊物的领导人也经常变更。

在文学体制的建立中,除了报纸、杂志外,“会议”也是重要的文学组织形式,它对当代文学的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有关文学的重要会议,是传达贯彻党的文艺

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步调、布置当前任务、制定长远规划、矫枉纠偏等的主要形式”^①。当代文学会议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它是建构适应政权需要的文学秩序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对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转换具有重要作用。总而言之,领导管理机构、机关刊物、报纸以及文学会议等因素共同建构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

文学批评和文艺政策也是构成新中国文学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较少从文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批评、评价,更多地发挥的是政治性的功能,文学批评没有独立的标准,政治话语规范即是文学的标准。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常常是政治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为政治服务的,它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政治对文学批评的过分干预导致了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和主观化,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种生活一个题材”、“一个题材一个主题”,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把作品中的艺术问题直接等同于作家的政治倾向和立场,在批评方式上随意“戴帽子”、“打棍子”,用词武断、粗暴,常常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或者莫须有地,就给作者按上了罪名”。^②

不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并不是完全单一化的。这是因为主流文学批评一方面要保证文学在政治上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另一方面也要保证文学对于政治宣传的有效性,对文学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进行纠正。因此,主流文学批评经常会在这之间进行调整,表现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方面各有侧重,而当环境允许时,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的矛盾性就会引起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界就出现过三次大的文艺争鸣,第一次是50年代初期围绕胡风、阿垅、路翎等的文艺思想展开的文艺论争,第二次是50年代中期“双百”时期围绕秦兆阳、陈涌、巴人、钱谷融、刘绍棠等的文艺观点展开的论争,第三次是60年代初期围绕邵荃麟、李何林等人的文艺观点展开的论争。这说明,文学批评的开展并非都能在规范和掌控之中,实践和理论之间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

同时,从事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除了以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冯雪峰等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以胡风、路翎、秦兆阳、黄秋耘等为代表,他们文学批评的理论思想表现出不同于主导的文学观念的勇气和坚持。最后,还有以作家为主体的经验式文学批评,如茅盾、赵树理、孙犁、周立波等的文学批评,他们的文学批评表现出对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重视。文学批评的这种分层也使得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表现出并非单一化的面貌。

①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② 于晴:《批评的歧路》,《文艺报》1957年第4期。

三 文艺批判运动和政策调整

文学批评在五、六十年代的极端形式就是文艺批判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四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五、六十年代文学批评活动的特点,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

(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孙瑜于1948年就开始拍摄电影《武训传》,描写的是清末山东堂邑县贫农武训行乞办学的事,不过拍了一半就中断了。1949年1月,私营上海昆仑公司收买了该片的摄制权和已拍的胶片。1950年,该公司对剧本进行修改后重新拍摄。电影由赵丹主演,孙瑜导演,到年底拍摄完成。电影公映后,好评如潮。但是,毛泽东看了这部电影后,却很不认同这部电影及大家的评价。1951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经毛泽东本人的大量修改后最后定稿的,基本可看作毛泽东个人的文章。社论认为《武训传》宣传了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并对目前文艺批评界的“混乱”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篇社论发表后,文艺界对《武训传》的态度急转直下,为了响应《人民日报》的号召,当时郭沫若、周扬、何其芳、邓友梅、夏衍、袁牧之等都发表文章作出回应,对《武训传》进行批判。然而,无论电影《武训传》有怎样的失误,都应该是文艺界内部的问题,而不应该形成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这次批判运动持续半年之久,首开用政治运动解决文艺问题之先河。

(二)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文学界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接踵而来。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1950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上,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李克和农民出身的革命妻子在解放进城之后所发生的矛盾。小说对妻子的生活、语言习惯和对李克的审美趣味的描写被指责有丑化“工农兵”、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嫌疑,当时陈涌、李定中(冯雪峰)、丁玲、康濯都写了批判文章。

(三)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其《红楼梦》研究受胡适研究方法的影响,注重考证,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他于1923年曾出版过《红楼梦辨》。1952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的基础上,通过对它的删改、增订,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一书。

俞平伯通过多年的研究,形成了对《红楼梦》的独特看法,他认为《红楼梦》是作者个人的自叙传,其表达的主要观念是“色”、“空”,风格是“怨而不怒”,在文学继承上是接受和发展了唐传奇、宋话本的传统,并受到了《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

等小说的影响,这些观点显然是与当时政治化的环境格格不入的。当时有两位青年研究者李希凡、蓝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对俞平伯的研究表示质疑,认为俞平伯否定了《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他们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并投到《文艺报》,却没有被接纳,后来另投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发表(1954年9月号),文章指出:“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的把水浒传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①

后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并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在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这是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随即,《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胡适、俞平伯,也指向《文艺报》编委。接着,文艺界全面展开了批判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四次扩大联席会议。这场批判运动由开始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逐渐转向对胡适文学观念的批判,并且由文学领域逐渐转向整个文化学术领域,这也是毛泽东发起这场文艺运动的真正动机,即彻底消除胡风等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存留。

(四)对胡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和诗人,作为“七月派”的理论建设者,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对“七月派”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文艺观念的差异,胡风与周扬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他们的矛盾造成了左翼内部两大阵营的分立。

1954年胡风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写成了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简称《意见书》)上呈给中央,他严厉地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的措施方案。之后,在对“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的批判中,胡风的发言也进一步把矛头引向自身。1955年1月26日,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意味着对胡风的批判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人民日报》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这些材料都经毛泽东审阅,在发表时都由毛泽东亲自加了按语和注释,至此,胡风事件的性质升级了。胡风于5月18日被拘捕,5月25日,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胡风案件”是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的一种极端体现,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包含着严峻的历史教训。

(五)文艺政策的两次调整

当政治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一种异常紧张的状态之后,会出现一个间歇和松弛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文学自身的弹性并调动作家创作的积极性,政治会给

^①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第9期。

予文学稍宽松的生存空间,1956—1957年间“双百”方针的提出,1961—1962年间文艺政策的调整,都是如此。在这些短暂的时间段中,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稍稍得到了一些恢复,对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1. “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八个字成为一句口号,有一个历史过程。从1951—1956年,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百花齐放”一词,而正式公开向全国阐释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是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全面地阐释了这一方针的内涵,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①自由宽松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空间是文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后人们经验的总结。

随着党对“双百”方针政策提倡的不断升温,文艺界的很多知识分子逐渐放下了心中的疑虑,过去不敢涉猎的题材开始有作家来关注,过去不敢谈论的理论问题开始有批评家来讨论、反思,文艺界出现了一派枯木逢春的景象。

首先是理论界对文学创作问题的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性、形象思维的问题,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歌颂与暴露、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特征和规律问题,以及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等问题都在这一时期被重新提出来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影响较大的文章有: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各种问题的反思和思考,体现出思想解放、大胆反思和质疑的特点。

其次,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敢于暴露和批判的被称作“干预生活”的作品。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反映“家务事,儿女情”题材的作品,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些作品由于涉足了一些过去的题材禁区,突破了过去陈旧的创作模式,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大的提升,因而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

^①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不过,随即1957年“反右”运动的迅速启动使知识分子措手不及,一大批在“双百”时期发表了“鸣放”言论的理论家以及一些发表“干预生活”作品的作家都被打成“右派”。“反右”运动中,当时在文艺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外,还有“江丰反党集团”、“吴祖光右派集团”等。“反右”运动中,周扬在一次会议上宣读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①是对这一场运动的总结。

2. 1960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不仅粮食、钢铁放出一颗颗“卫星”,在文学领域,诗歌创作也展开了“新民歌”运动,无数的诗人和诗歌一时间被生产出来,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浮夸的状态。此外,从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反右倾”、“反修正主义”这些天灾人祸使得当时国家的状况雪上加霜。针对这种状况,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民经济等各个方面从1962年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同时,从1961—1962年,文艺界也进行了方针政策的调整,对文学典型、题材,文学共鸣,山水诗,戏剧冲突和历史剧,形象思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次的文艺政策调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这次调整期共召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它们是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简称“新侨会议”),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简称“广州会议”),以及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大连会议”)。这三次会议对当时文学状况的调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作为这几次会议精神集中体现的是最后下发的“文艺八条”,它最初的雏形是在新侨会议讨论的文件《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文艺十条”),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在广州会议后报送中央被批准。中央出台了八条全局性的指导原则,即所谓的“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

第二节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

一 农村题材小说成为主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征

^① 该文原载1958年2月《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4期《文艺报》。